

# 東方智慧之光

道中題




池田大作研究論綱

蔡德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 東方智慧之光

道中題  


蔡德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是世界著名的宗教哲学家、诗人、摄影家及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以来，他为中日友好事业尽心尽力，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本书作者对池田大作素有研究，这本著作是其研究论集。他在书中对池田大作的人道主义思想，进步的宗教理念及历史观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和分析，提纲挈领地指出这位亚洲佛学家的思想与成就正代表了东方文化的智慧，并对他在中日友好事业上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评价。作者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书中夹叙夹议，深入浅出、文笔流畅，是一部有助于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池田大作与东方文化的学术著作。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智慧之光——池田大作研究论纲/蔡德麟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ISBN 7-302-07068-7

I. 东… II. 蔡… III. ①池田大作—人道主义—研究 ②中日关系—研究  
IV. ①B089 ②D822.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1055 号

出 版 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邮 编: 100084

客 户 服 务: 010-62776969

责任编辑: 聂 鑫

版式设计: 刘祎森

印 刷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40×203 印 张: 6.25 插 页: 4 字 数: 122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7068-7/B·32

印 数: 1~3000

定 价: 25.00 元

弘揚東方文化  
促進中日友好

季羨林



季羨林先生为本书题辞

# 序 一

黄楠森

季羨林先生为本书写的题词“弘扬东方文化，促进中日友好”，不仅是对池田大作先生的言论和行为的恰当的评语，也是对本书的恰当的评语。

本书作者蔡德麟教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池田大作先生的著作进行过研究，在担任深圳大学校长期间曾邀请池田大作先生到深大讲学，并聘请他为名誉教授。蔡德麟教授也几次应邀到日本创价大学讲学，并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本书就是蔡德麟教授在这些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作出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的主题有两个，一是弘扬东方文化，一是促进中日友好。属于第一个主题的有《东方人道主义的当代智慧》、《池田大作进步的现实主义的宗教理念》、《池田大作历史观述评》，属于第二个主题的有《历史的丰碑——池田大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贡献》、《池田大作与中国领导人的友谊》。当然，这两个主题

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交错和互相渗透的。

东方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本书不可能涉及它的一切领域。本书只涉及历史观、人学、宗教观等几个领域。在这几个领域中，作者的分析都涉及三个方面：传统的东方文化、池田大作的观点和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作者本人的观点。这三个领域是东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领域，池田大作传承了这些领域的精华而有所发展，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以评析，颇能收到推陈出新之效。例如作者把东方人学思想（主要是中国传统人学思想）概括为四个方面：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关于人际关系的思想、人性论思想和理想人格思想。这种概括我是十分赞同的，它既表现了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普遍性，又表现了其特殊性。作者以这样的理论框架为线索评述了池田大作的人学思想，不但使人有了一个系统的理解，而且使人易于掌握池田大作的人学思想的精华。作者还以这样的系统理论为基础重点介绍和分析了池田大作的佛法人道主义，指出它不仅继承了东方人道主义的精华，而且在今天形势下有其积极意义，它是以民众为主体的人道主义，是以和平为目标的人道主义，这是符合今天世界人道主义思潮的主流的。

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的理念是东方文化的内容之一，无疑是应该弘扬的。本书作者用将近一半的篇幅通过介绍池田大作所作的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贡献和他与中国几代领导人的交往，高度评价了他关于中日友好和世界和

平的思想。池田大作认为“中国历来不具有侵略性”，这是符合中国历史的论断。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是一个备受侵略的国家，深知被侵略之苦，所以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反复重申中国爱和平、不称霸的心愿。20世纪60年代池田大作还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巨大的国家”，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地位、同它建立正常关系“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池田大作敢于同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胆识，这大大推动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友好。后来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池田大作的主张，中日关系正常化30年来，中日友好关系不仅日益巩固，而且不断发展。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日友好必将排除各种干扰而不断加强。

总而言之，弘扬东方文化，促进中日友好的主题通过对池田大作的理论与实践的评价在本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充分的体现。

## 序 二

孙立川

摆在案头的这本论集《东方智慧之光》是我读过多遍的书稿。作为本书香港版的编辑，我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作者是我所尊敬的师长，又是一位著名的哲学研究者，他命我为此书撰写“序言”，这本是万万不敢当的事，因而一再婉谢，但蔡先生却也一再诚意邀请。回想起他在写作期间四处搜罗资料，反复求真，溽暑之季也成日价埋首于书堆之中。其认真治学、不耻下问的态度令我感动，因而也就斗胆受命，“放肆”一次。在此谈谈我在阅读本书之后所激发出来的一些肤浅之见，权作附丽于此学术论著的皮相之谈，抛砖以引玉矣！

池田大作先生是国际知名的宗教思想家和和平人士，同时又是一位热爱文学艺术的摄影家与诗人。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他就奔走于世界各地，推动文化、教育交流活动，大力呼吁反核、反战和反暴力运动。他与世界各国的



政治家、科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对话，将友谊的种子撒向四方。他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坚定地支持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事业，这也是本书作者为何写作此书的初衷。

翻开《东方智慧之光》，我们的思绪会随着作者的论述穿越时光隧道，重返三十多年前的“冷战时代”。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的纪念。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鲜有了解这段历史的——为了这个正常化，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是经过了多少艰辛的跋涉，才走过了这段坎坷的历程的。三十年弹指一挥间，那些曾为达成这个目标而前仆后继的中日两国的志士仁人相继谢世，但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掘井人”的历史功绩。见证过这段历史，并且为之身体力行的健在者之中，池田大作先生就是一位佼佼者。关于池田先生早在1968年的两万人集会上倡言恢复中日邦交，打破当年中日关系的困局，如何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而锲而不舍地努力的史实，曾有日本奈良日日新闻社出版的《日中恢复邦交秘话》、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以及孙平化、林丽韞等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的文章予以证实，但这些文章以回忆文字为主。本书首次从思想理论的角度对池田大作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努力作出理性的探讨与分析。尤其难得的是，作者找到了池田大作先生1968年12月发表于《亚洲月刊》上的文章：《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提言》，和1968年

在两万人大会上的演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概括性地提出“三位一体”的“池田倡言”的说法是有见地的。(“三位一体”即: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发展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三者相结合为一体)这“三位一体”是当年重建中日友好关系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途径是举行中日首脑会谈。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作者的这些综合性的分析,对于帮助读者理解池田倡议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是有意义的。池田的《提言》因为创价学会拥有数以千万计的日本中下层民众,因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无可估量的,这也是其他主张中日友好人士所无法具备的社会动员力量。由池田先生一手促成的公明党访华团所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五个条件(或称五项原则)也是基于这个《提言》而产生的。

一直亲自处理中日关系的周恩来总理敏锐地发现这一新动向,“五项原则”一经提出,就受到他的赞赏与支持。周总理注意到创价学会在日本民间所拥有的草根阶层的资源优势与广泛影响。这也是周总理在重病缠身时仍不顾医嘱,坚持要在医院中会见池田大作的主因之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及,周恩来总理生前接见过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士,其中有的日本朋友见过不下几十次。但从没有一个人像池田大作一样,短短的几十分钟的会见竟成为他半生中念念不忘、不断宣传、提及的人,他对周总理的感情之深令人感动。他曾经表示过,在近代中国的伟人之中,他

最崇敬的有三位人物，孙中山、鲁迅与周恩来，而周总理是他惟一见过面的伟人。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谨记周总理对他的托付，为中日两国的友好事业无怨无悔地工作。去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日本创价学会举办了“周恩来展”，在东京、名古屋等地巡展，这再次证明了以池田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友好人士缅怀周总理，矢志推动中日友好的决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周总理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政治遗产，正是由他亲手奠基的这种关系，团结了千千万万的日本友好民众，这是中日友好最重要的基石。

近十年中，中日关系的发展，不时受到人为的干扰，其中最主要的障碍就是日本右翼思潮的抬头，他们在历史问题上大做翻案文章，由原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公职参拜靖国神社之后，日本的几位在任首相也不顾中、韩等国的反对，陆续以公职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曾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和人民的感情。挟着这股泛起的沉渣而来的波澜，加上经济贸易纠纷，有人炒作“中国威胁论”，有人欲为侵略战争重披“大东亚圣战”的华服袈衣。对于中国人民所作出的抗议之声，右翼政客大肆鼓噪，来势汹汹，连一些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也不敢撻其锋，或避之不及，或附和其说法，也指责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反应过甚，云云。“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许多富有正义感的日本有识之士却勇敢地站出来，维护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池田大作先生不仅亲自撰文在大报上表态，反对小泉纯一郎首相以公职参拜靖国神社，而且严斥那些美化

侵略战争的言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因而遭受到右翼团体的疯狂围攻，他们将宣传车不停地围住日本创价学会本部置骂，更有一些媒体挟个人私怨，捏造事实，造谣惑众，恶毒攻击池田大作串谋中国政府干预日本内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于这些铺天盖地的围攻谩骂，池田大作先生始终大义凛然，横眉冷对。

我认为池田大作先生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是基于他一贯的历史观。他自六十年代初担任第三代创价学会会长之后，就追随第一代会长牧口常三郎、第二代会长户田城圣先生的遗志，秉承他们在军国主义时代因反战而被投入监狱的反法西斯主义理念，对“皇国史观”进行彻底的批判，本书的《池田大作的历史观评述》对此有系统及深入的阐述与分析，对于中国人了解池田大作的反战史观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池田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美国、亚洲等国家人民带来的痛苦与损害，同时也揭露了这场侵略战争对日本老百姓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无论是在他创作的诗歌、小说及论文、演讲中，还是他与世界各国的贤达对话时，他总忘不了以自身及家庭的战事体验带出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法西斯主义挑起的战争给邻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他主张日本应真诚地反省，并向亚洲邻国道歉谢罪。这种精神就是他为何坚定不移地推动中日友好的源泉，他亦以同样的精神推动日本与韩国的友好关

系，因而赢得韩国朝野的尊敬。

以史为鉴，是池田先生对中日关系定位的一个主张。他曾深入地研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早在与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对谈时，他就指出，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尚文”是一种传统，中国是一个并无侵略性的国家。在与金庸的对谈中，他们也曾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池田先生的这种历史观对于当今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也是当头棒喝，不无现实的意义。

放眼未来，则是池田大作先生对中日世代友好的一种远见。我曾听过中国驻日的一些外交官员慨叹，现在有时参加日本各地举办的一些中日友好集会，所见尽是白发苍苍的参加者。因而，为了不让老一辈两国友好人士艰难确立的这种关系走向倒退，教育年轻一代就显得十分重要。池田先生无论在大小场合，总是一再谆谆教育日本的青少年要世代地同中国人民友好下去，他言传身教，不仅一以贯之地实践他对中日人民的友好誓言，而且对追随他的弟子们及学会的青年部、学生部的年轻一代也时时指导教育。由他所创办的创价大学及关东、关西创价学园中，学生们在小小年纪就已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在这些校园中，任何中国人都会感受到他们的纯真的友好之情，这种情景在日本的大中小学校园中真是凤毛麟角。于此，足证池田先生对中日友好的良苦用心之所在。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此书的出版也是对曾为此作出贡献的日本友好人士表达“饮水思源”的拳拳

心意。

作为日本最大的宗教团体的指导者，池田大作一再谦称自己只是一名大乘佛教的佛教徒。他的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写作勤奋，不仅撰写了大量著作，不断地同世界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对话，而且也平易近人地同一般民众倾心交谈。他致力于反核、反战、反暴力的和平运动，以文化、教育交流为途径，以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弘法，关心和帮助第三世界及各地的弱势群体。他与一般的佛教派别领袖不同的是，他不囿于传统佛教的宗门科仪，而注重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教义，主张以每个人自身的“革命”（修养）来达致整个社会的进步。高尔基曾说过：文学即是人学。我认为池田大作则是“佛学就是人学”，这种思想可谓改变了传统的佛学思想。以人为本，是池田大作宗教观的一大发明。在他庞大的思想体系中，“人学”始终是其核心的主轴，在他的语境系统里，“人学”是频繁出现的词语。他认为，“人学”思想是契合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的本意的。

他的“人学观”表现出浓郁的人道主义思想，本书作者将之誉为“东方人道主义”的当代智慧，并以专文来加以讨论。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兴起于西方。所以在一般人眼中，人道主义的判别标准都以西方的理论为准绳。本书作者特地指出：池田所主张的东方人道主义与西方人道主义的多种形态“如古典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以及当代的存在主义

的人道主义”等等都有所不同。因为它是以东方“人学”思想,特别是以东方人本主义思想作为哲学智慧和理论基础的,简言之,也就是中国文明所代表的“无神文明”的仁学思想,同时又结合佛教的人道主义内涵及特色。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二是关于人际关系的思想;三是关于人性的思想;四是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因而,其人道主义又具体化为佛法人道主义,其核心则是“坚定的和平主义”。

关于“人道主义”的研究,在中国国内还是没有充分予以开展。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论争,但彼时尚是思想解放运动初期,这场讨论并没有很好地展开就结束了。我对于人道主义的认识十分有限,客观上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前,“人道主义”论争始终是哲学理论的一个禁区,我们在求学年代中也就不可能对人道主义,尤其是西方人道主义有深入的了解与学习,这恐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学识方面的缺陷或弱项。主观上则由于自己愚钝慵懒,视哲学理论为难事,从不敢置喙。但我认为,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学界也在日渐进步地与世界接轨,新人辈出、信息丰富,而思想禁锢的教条已渐为人们所唾弃,人们可以用更开放的态度来研讨人道主义问题。因此,本书作者对东方人道主义所作出的论见,亦可视作一种新的探讨。

从这个命题上,我还联想到近年兴起的“亚洲价值论”,这个由东南亚的国家领袖关注及太力提倡的理论,究

竟与亨廷顿所鼓吹的“东西方文明冲突论”有无分庭抗礼之意？“九·一一”事件所引发的有关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文化对峙的论争，等等，都是值得讨论的。

因为教义的不同，是否就要以暴力抗争当作立教的手段，以暴易暴，有我没你又能否唯我独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全球宗教学者亟应考虑的问题。池田大作先生主张不同的宗教之间也应当通过对话来寻求解决歧见，和平共处。他以开放的姿态与有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文化背景的学者、政治家及宗教学者对话时，总是能以平等的心态来探讨人生、社会问题。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将佛学与现代社会予以更好的整合，对世俗社会给以更多的人间关怀，而不是停留在传统的衣钵传承之上，他还重视吸取西方文化的精神遗产，接纳异国文学、音乐、美术、文化的精粹，改变了佛教界因循守旧的传统。譬如当创价学会的会员举行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大合唱时，日本佛教宗门的有些人就觉得此举是离经叛道。他经常指导在全球各地的国际创价学会会员，希望他们首先要做一个好市民，关怀弱势群体，促进环保、反战的和平运动，进而再当一个地球村的好村民，弘扬佛法的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的这些宗教观是具有前瞻的视野的，也是有创意的东方式的睿智之见。本书作者对其宗教观念的探究是一个新的尝试。

中国先哲老子说过：“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



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五十四章）其意乃是强调“圣人”应“以百姓心为心”，能以心系天下民众作为自己修行的标尺，这是最高的德行。本书作者认为，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而言，池田大作先生是一位中日友好活动家，又是一位人道主义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宗教思想家，这三方面又都折射出东方文化的智慧之光，他是扣紧这个主题来阐发和论证的。我以为此书提出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将池田大作置于宏伟的东方思想与文化的框架中来作一个横向的研究，此书或许是第一本这一研究领域的专门论著，作者以“论纲”点破主题，这意味着他将就这项研究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我们期待着后继的力作将陆续问世。

末了，我还想特地指出：池田大作先生首次访华是经香港踏入深圳的，他对于香港与深圳这两个城市怀有一种热烈的感情。他是深圳市的第一位“荣誉市民”，深圳大学也曾颁发“名誉教授”荣衔于他。本书作者曾任深圳大学校长，亲自主持池田先生在深圳大学举行的演讲大会，后又多次与他作过学术对话，因而对池田先生可谓十分了解，甚有研究。而今，作者在深圳完成了这部书稿，择先在香港出版繁体字版，信是有缘。

开首的时候曾说过，自己本不配为此书作序的，承作者错爱，不敢拂其好意，爰将自己的一些感想率性写出。限于学力不逮、识见不深，当有谬误之处，恳请作者和读者恕我粗疏浅陋。是为序。